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潘毅 古学斌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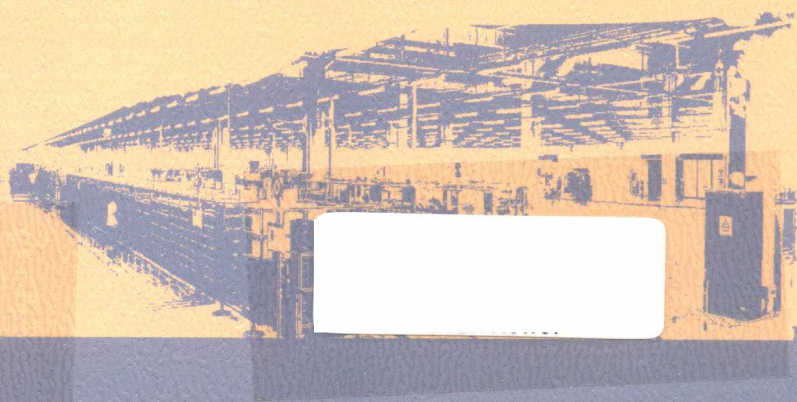
鸣谢利丰社会政策基金会

*Economic Democracy:
Ideologies and Issues*

经济民主

主义与问题

宋磊 孙晓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潘毅 古学斌 主编

鸣谢利丰社会政策基金会

*Economic Democracy:
Ideologies and Issues*

经济民主

主义与问题

宋磊 孙晓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民主：主义与问题 / 宋磊，孙晓冬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8467 - 9

I. ①经… II. ①宋… ②孙…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
民主 - 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6521 号

· 社会经济研究丛书 ·

经济民主

——主义与问题

著 者 / 宋 磊 孙晓冬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高 雁

责任编辑 / 于 飞 陈 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3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467 - 9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过去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深层社会矛盾。十八大提出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而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的焦点。

“十二五”规划提出通过城镇化来弥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落差。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现对国土的高效利用。这意味着，为了配合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即将全面展开。农民变成居民，一个缠绕在农民身上几十年的沉重的咒语似乎忽然解除了，换来的是一个轻飘飘的居民身份。农村变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资本愿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戏剧化地在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化等政策口号之下迅速完成。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土地被资本高效地使用了，农民和工人是否因此过上了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通过农村土地流向城市工业资本以及地产资本开放所带来的身份与空间转换，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很可能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尴尬的状态。

那么，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同步进行？

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侵入农村社会，将土地和农民进行彻底的商品化，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资本垄断的不可避免，人与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对社会与环境的破坏；而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缺乏灵活性，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生产参与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则最大可能地避免了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吸收了这两者的长处：它整合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承继了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开放性、非垄断，是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都是社会经济的具体实践。在走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接着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我们希望通过此套丛书，为推动社会团结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前 言

从学术争论到原创性实践： 中国的经济民主问题的转型

在英国之后开始发展进程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后进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成功地实现追赶的后进大国的经济崛起往往伴随着具有原创性的管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出现。在美国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在企业层面，出现了所谓“美国生产方式”和管理者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学派在这一时期形成。在“二战”后德国的发展过程中，在企业层面，出现了包括劳资协调机制在内的企业制度；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大量出现。在“二战”后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在企业层面，出现了以日本式劳资关系为基础的精益生产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广泛关注。

与上述成功地实现追赶的三个曾经的后进大国相比，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地实现了规模的扩张，但是在企业层面并没有出现具有范式变迁意义的原创性的组织形态，关于中国型市场经济的相关理论也有待深化。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企业组织形态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这种双重匮乏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企业实践没有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突破提供素材；另一方面，相关领域的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也没有充分地发挥指导企业实践的作用。

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层面的经济民主对于具有原创性的组织形态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民主也可能在中国企业进行组织形态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除少数例外，经济民主没有受到中国的企业管理者的重视。考虑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社会主义传统，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上述现象不但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是难以理解的。

尽管经济民主在实践中不是改革的主轴，但是在中国学术界仍然存在关于经济民主的研究。实际上，如果说经济自由是中国学术界关于改革方向的研究的主题的话，那么经济民主则是中国学术界关于改革方向的研究的潜在主题。蒋一苇、崔之元等学者就这一主题发表过重要的研究论述，倾向于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地和经济民主论者进行着持续的争论。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以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为代表的具有经济民主因素的改革措施逐渐地进入实践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民主问题正在从学术议题转向实践。另外，在一般意义上的企业中的经济民主问题之外，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具有合作经济或社会经济特色的经济民主实践。在经济民主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之一的背景下，中国的合作经济或社会经济能否实现扩张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在过去几年中，本书的两位作者围绕经济民主问题，持续地发表了一批论文。这些论文涉及经济民主问题的研究格局、经济民主与中国经济的关系、经济民主与东亚奇迹的关系、经济民主与政策范式调整的关系四个主题。在上述主题下，这些论文讨论了经济民主研究中的“主义”和“问题”两个侧面，前者指什么是经济民主、什么是经济民主的理论基础以及是否应该推行经济民主等经济民主研究中的理论议题，后者指如何设计具有经济民主特征的政策措施和企业组织形态、如何提高这些政策措施和企业组织形态的有效性等经济民主研究中的实践议题。

在中国的经济民主问题正在从学术议题转型为实践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希望这批论文能够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作为学术研究议题的经济民主问题，推动中国发展具有原创性的经济民主实践。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经济民主的研究格局

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中的“主义”与“问题” / 003

中国的经济民主论：研究路径、关键议题与推进顺序 / 018

第二部分 经济民主与中国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分析 / 039

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 / 051

找回劳资关系：基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经济研究的再转型 / 063

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类型与演进：基于生产方式视角的分析 / 074

模块化的发生机制与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 / 094

创新方式的创新：大国崛起的微观基础 / 104

样板和对手：日本经济模式论之于中国经济模式论 / 113

第三部分 经济民主与东亚奇迹

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民主与生产扩张 / 129

道尔－岩井论争与利益相关者论的系谱及演变 / 145

道尔的乡愁与日本型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 / 166

一个企业，两种共同体：后福特主义的社会经济
要素的特殊形态 / 176

第四部分 经济民主与政策范式

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及启示 / 191

在理念与能力之间：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 / 213

第一部分

经济民主的研究格局

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中的“主义”与“问题”^{*}

平等和自由是政治哲学中的一对关键范畴。作为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对应物，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似乎存在张力。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关于经济民主的争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表现形式及其背景都是特殊的。

在中国，经济民主论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倡导者是林子力、蒋一苇等学界前辈。这一时期的经济民主论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没有在思想界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次热潮由崔之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动，^①并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激烈回击。这场争论在《读书》和《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展开，被视为新左派浮出水面和知识界开始分裂的标志之一。第三次热潮是近年来随着新左派“主将”连续地围绕经济民主或社会民主阐发立场和展开论述，经济民主问题再次成为热点。^②

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左右两翼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直接交锋，第二种形式是左右两翼在近期展开的间接对抗。近年来，自由主义者在经济民主论的第三次热潮中集体缺席，其结果是这一次热潮成为新左派的独角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两派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在对立格局已经固化而且经济民主成为新左派所主张的民主的核心内容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改变立场，他们的缺席应该被理解

^{*} 原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第4期。

^①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② 崔之元：《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http://www.cui-zy.cn/>；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51～255页；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上）》，《文化纵横》2011年第5期。

为“默杀”或“腹诽”。换言之，经济民主之争仍然在持续，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很明显，和当下的怪异对阵相比，20世纪90年代激烈争论的建设性要高一些。

作为左右两派在经济民主问题上的一次全面交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派的争论主要围绕“在当下的中国提倡经济民主究竟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以及“鞍钢宪法”的背景和效果等问题展开，没有深入地讨论推行经济民主的具体途径。更为重要的是，除个别例外，关于经济民主的近期研究仍然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设计，而停留在原则论的阶段。崔之元关于“国有资产收益归公”或“全民分红”问题的讨论当属为数不多的例外。但是这些讨论也是高度理论化的，并没有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①一言以蔽之，无论从论战的表现形式，还是从论战的主题来看，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都具有中国特色：这一论战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左右对峙的基本格局，也体现了中国思想界避实就虚的论述风格。

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以上述形式展开的原因既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就前者而言，在全国性、权威性、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具有“同人团体”性质的学术圈子。这些圈子往往横跨不同学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即使没有持不同意见者参与，这些跨学科的学术圈子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讨论。从后者来说，关于经济民主，特别是关于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经济民主这一议题，持有不同立场的思想派别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非常尖锐，以致屏蔽了与“究竟什么是经济民主”和“到底为什么要推行经济民主”相关联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具体问题。在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如何在中国推行经济民主”这一重大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借用五四时期的术语，“主义”对于“问题”的屏蔽使双方失去了通过对话磨砺己方主张的机会，扼杀了双方求同存异、共同推动改革进程的可能性。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以对话来实现左右两翼的和解并形成共识。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这样的环境下，沟通左右两翼关于经济民主的认识似乎无异于天方夜谭，任何试图从中立的立场来讨论经济民主问题

① 崔之元：《重庆试验的三个理论视角：米德、乔治与葛兰西》，《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的人都可能动辄得咎。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健康发展而言，左右两翼的相互激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泛左翼的一员，笔者对新左派关于经济平等以及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的持续关注一直怀有敬意。^①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自由主义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而且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别。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在除去意识形态的屏蔽，进入具体问题的层面之后，我们很可能发现左右两翼的对立并非是不可调和的，而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民主方案有可能为破解当前的改革困局提供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界关于经济民主问题的讨论横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主题纷繁，内容复杂，崔之元等学者近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不是本文可以胜任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只是从平等——经济民主论的逻辑起点——出发来讨论阻碍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就经济民主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的意识形态背景，展示被意识形态之争屏蔽的可以让两派展开讨论的具体议题，推动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民主政策的落实。

一 “主义”的对决

在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背后，存在两组“主义”的对决。其中一组“主义”的对决的影响是直观的，而另外一组“主义”的对决的影响则是隐秘的。正是这样两组“主义”的对决左右了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走向，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是精英主义民主观和大众主义民主观之间的对抗的表现。精英主义民主观依托的是熊彼特以来的主流民主理论，强调以竞争性的周期性选举为核心的多党间对抗和结构性制衡；大众主义民主观继承的是卢梭和马克思的民主观念，其要点在于“人民主权”或“人民民主”。很明显，这样两种民主观之间存在强烈的张力。萨托利正是从前者出发，将经济民

^① 笔者也参加了关于经济民主的研究。因此，如果说本文对新左派的经济民主论有所批评的话，那么这种批评首先是指向笔者自己的。另外，在这个议题上自由主义者批评多、建设少，因此本文主要围绕新左派的研究展开。

主斥为“放浪形骸的概念”,^①而王绍光也正是依据后者将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视为对古典民主精神的背叛和矮化,是背离“真正的民主”的“赝品”。^②在这样两种近乎南辕北辙的民主观支配之下,论战的双方自然很难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主流民主理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精英主义民主观,是因为其建立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在主流民主理论的框架下,政策的制定只能由选民选出的少数代表完成。类似的,卢梭和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大众主义民主观,是因为其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让众多平民直接参与或发挥更大作用的制度框架。在主流民主理论家看来,所谓民主主要指政治民主或竞争性的选举机制,其他形式的民主,如韦伯夫妇倡导的产业民主和社区自治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不但和政治民主不在一个层次上,而且只有在存在竞争性选举的前提下才有讨论的必要。更为重要的是,主流民主理论家认为,所谓经济民主远远超过了产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范围,其本质是一种“共产主义经济”,^③是对政治民主的彻底否定,持精英主义民主观的学者排斥经济民主议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相反,在新左派看来,古希腊民主是民主的源头,其特征是以抽签选举和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参与,所谓现代民主不但通过在民主之前附加“自由”和“宪制”来限制民主的范围,而且通过代议制和竞争性选举来排斥大多数人的参政机会。^④在这样的逻辑下,他们主张重建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即推动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并主导的民主。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人口远远超过古希腊的现代国家推行直接民主。尽管新左派理论家们试图在现代社会重新挖掘抽签式选举的价值,但是这种思路的可行性显然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活动和广大民众直接相关,所以经济民主自然成为新左派极为重视的议题。^⑤

第二,如果说两种民主观的对立塑造了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基本格局,那么“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分殊则将两派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①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22页。

② 王绍光:《民主四讲》,第242~243页。

③ 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2~23页。

④ 王绍光:《民主四讲》,第3~10、33~54页。

⑤ 崔之元通过对卢梭的重新解读论证了人民主权的原理。崔之元:《卢梭新论》,《读书》1996年第7期。

进一步放大。这里所说的“市场主义”是指中国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市场观。这种市场观推崇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主张政府的介入应该局限在健全法制基础和维护社会信用等方面，因此，这种观念的持有者强烈地反对国家对于经济自由的限制。客观地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市场观不同于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是这种观念基本上是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主要参照系的。我们将看到，这种认知模式严重地影响了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民主问题的思考。

精英主义民主观和“市场主义”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但是国家主义在逻辑上并不是西方新左派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正是西方新左派兴起的基础之一，西方新左派理论家之中与国家主义保持距离甚至对其采取排斥态度者亦不乏其人。然而，中国的新左派理论家们在整体上却对国家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热情只能形容为异乎寻常。

首先，尽管新左派理论家们并没有否定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对于市场机制之中存在的问题的批判构成了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一点在崔之元那里得到了最为理论化的论证并在王绍光那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展开。在崔之元看来，公司有限责任制、中央银行制度和破产法在美国经济中遇到的挑战意味着西方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预算软约束”现象，“看不见的手的范式”不是完美无瑕的。^① 因此，彻底的私有化不是最好的出路。相反，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下，保留国有企业并开展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竞争才是理想的方案。崔之元主张的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民主在相当程度上分别和国有经济以及合作社所体现的组织原则高度吻合。因此，他的上述论述实际上指出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意味着中国需要走经济民主之路。很明显，由于为普鲁东意义上的经济民主预留了空间，所以他的上述论述并不直接指向国家主义。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的论述方式也为国家主义打开了大门。实际上，崔之元关于经济民主问题的近期论述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的作用。^② 相对而言，王绍光的一系列研究强调中央政府在改革的

①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② 崔之元：《重庆试验的三个理论视角：米德、乔治与葛兰西》。

过程中应该强化财政能力和集中权限，以回应变化了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抑制市场化所产生的问题，其国家主义色彩更为明显。^①

其次，一般来说，市场、国家和社会是市场经济中的三种主要协调机制，因此，对于市场机制的批判并不必然导向国家主义。但是，对于市场机制持保留态度的中国新左派理论家对公民社会的负面评价则表明了其国家主义立场。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公民社会的发展是连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关键中间环节。^② 换言之，公民社会的发展构建了对政治权力的“社会制衡机制”，从而为多元主义民主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从托克维尔到达尔的民主思想的精髓。^③ 但是，在中国的新左派看来，公民社会理论忽视了阶级因素，高估了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制约功能，其意识形态的基因是自由主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公民社会的发展或许可以提高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但是未必可以带来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行“站在人民立场的国家干预”，以改造公民社会。^④

二 被“主义”屏蔽的“问题”

上述两组对立的意识形态叠加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呈现特异的形态：这种叠加使左右两翼在经济民主问题上表现出结构性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使双方难以对什么是经济民主、为什么要推行经济民主以及如何推行经济民主这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并形成共识。

对新左派来说，什么是经济民主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依据新左

①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② 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顾昕：《以社会制约权力：达尔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与公民社会理念（译者后记）》，第168页，载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充版）》，顾昕译，东方出版社，2009。

④ 王绍光：《关于“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6期；王绍光：《“公民社会”祛魅》，《绿叶》2009年第7期。